

汉文化 多元文化与 西部大开发

——2003 年汉民族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揣振宇 杨荆楚 主编

民族出版社

汉文化 多元文化 与西部大开发

——2003 年汉民族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揣振宇 杨荆楚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化 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揣振宇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6

ISBN 7-105-06697-0

I. 汉... II. 揣... III. 民族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89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编委会主任 杜荣坤(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研究会会长 研究员)

副主任 揣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研究会副会长)
范祖铸(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巡视员 编审)

编委会委员 杜荣坤 揣振宇 范祖铸
杨荆楚 周竞红 杨 华

主 编 揣振宇 杨荆楚

目 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西部多元文化	李富强(1)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杨荆楚(21)
论伦理道德建设与西部大开发	陈伯强(51)
西部大开发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周竞红(65)
弘扬和合精神 促进西部开发	王燕群(75)
相融相生 共促发展	常巧章(84)
晚清政治精英与西部开发	张立真 侯爽(90)
海南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	王辉山(99)
试论黎族与汉文化的关系	练铭志(112)
论满汉民族关系	张佳生(128)
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	孙九霞(138)
西南民族关系史上的惨痛一页	房锐(151)
以文化结构的层次理论解读“政治文明”的涵义	邸永君(161)
城市多民族化和文化多元化	李筱文(167)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内涵和现实意义	肖栋梁(179)
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霍彦儒(190)
先秦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	李大龙(203)
秦与渭水上游各族初探	徐日辉(230)
汉族族称的起源与流变	高 强(245)
东南土著动物神灵崇拜对福建汉民族社会	

文化的影响	秦慧颖(261)
楚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与流变	陈先枢(278)
越、汉文化在福建的消长与融合	黄英湖(282)
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程有为(298)
从汉文译著的产生看回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杨 华(310)
从客家文化的多元因素看汉、畬民族的交融	罗 勇(324)
洪武年间云南的移民开发与民族融合	万芳珍(333)
论管仲对华夏文化的杰出贡献	宣兆琦(358)
从谱牒资料看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并济	董建辉(367)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	邓晓华(383)
“面缚”考辨	张维慎(397)
附录一:贺信(电)	(411)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志民教授贺信	(411)
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贺信	(412)
温州市社科联贺电	(414)
附录二:讲话	(415)
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415)
2003 年昆明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讲话	(418)
在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推进汉民族的研究	(420)
2003 年昆明汉民族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427)
后 记	(43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西部多元文化

李富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正成为全国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多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至为关键。而维护和发展西部多元文化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

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神圣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不懈地探索着实现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同志曾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发展经济,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使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用了 100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毛泽东预计也要 100 年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然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并不平坦。在历尽曲折和坎坷之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小康社会理论即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初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源自《礼记》,它是与“大同”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礼记·礼运》中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的是“大同”社会——尧舜时代的儒家的乌托邦,而“小康”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形态。据《礼记·同》:“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以及洪迈《夷坚甲志·五郎君》:“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等阐论,古代“小康”反映的是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追求政通人和、生活殷实、安居乐业的理想。邓小平同志赋予“小康”新的内涵,以之指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为了纠正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2月6日,他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自此之后,小康社会理论不断完善。1982年9月,党的十二

大报告指出：“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城乡居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将“小康”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是我们的新概念。”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1987 年 4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同年 10 月，“三步走”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被正式地提了出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1991 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小康的内涵作了新的阐述：“我们所

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在此阐述中,正式加入了精神生活、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等方面的内容。从1991年开始,在中央的领导下,国家有关部委在充分吸取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进程,提出了一整套监测的目标和指标。这些指标有3类:人均产值指标;人均收入指标;综合民生指标。包括人均GDP、城市人均收入、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成人识字率、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居民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居民电视机普及率、森林覆盖率、农村卫生保健合格率等项目。1997年,党的十五大制定了到2010年、建党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发展目标,即新的“三步走”战略,明确提出,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从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则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伟大任务。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殷实。”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小康”概念到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理论之炬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十六大政治报告对小康社会的论述,不仅包含了一般的社会民生的内容,而且增加了民主政治、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四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果说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所体现的发展理念是以民生为本的话,那么,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所体现的发展理念则是以人为本。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3%,到 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5933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近 2 倍,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世界第 6 位。人均 GDP 再上新台阶,突破 900 美元。按照 1995 年修订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1999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水平、城乡交通状况、恩格尔系数、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教育娱乐支出比重、电视机普及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已实现小康;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的实现程度分别达到 94.6%、88.4%和 91.5%。据综合测算,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 94.6%。到 2000 年,在 5 类共 16 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的 3 项指标外,其他 13 项指标均已达标或超标。全国小康实现程度达到 96%,总体上已实现小康。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已胜利实现。但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为 840 美元,在世界 20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141 位。2001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900 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 2.3%,属于中下收入国家水平。在 2000 年 3 个未实现小康的指标中,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仅实现 90%;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实现了 85%;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仅实现 80%。2000 年人均 GDP 达到 800 美元的仅 15 个省市自治区,西部人均 GDP 只有 600 美元。此外,2000 年,我国农村尚有 3000 万人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城镇也有 2000 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因此,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到 21 世纪中叶,我们国家就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至为关键

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西部与东部发展不平衡。据统计,我国西部总面积 671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 70%,2000 年底人口 35531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8.59%,可 GDP 仅占全国的 18%;2000 年东部人均 GDP 已达到 1400 美元,而西部只有 600 美元;1986 年国家确定的 664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东部地区 171 个,中部地区 232 个,西部地区 261 个,西部占了全国总数的 39.31%,到 1994 年,全国 592 个贫困县在东、中、西部的分布分别是 105 个、180 个、307 个,西部占了全国总数的 51.86%,在 2001 年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中,东部 97 个,中部 7 个,而西部地区一个没有;从农民人均收入来看,1998 年,东、中、西三大地区之比为 1.94:1.35:1,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浙江,人均 3814 元)与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西藏,人均 1232 元)之比达到 3.1:1;就小康实现程度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已达到 97.86%,中部已达到 93.18%,而西部只有 84.18%。西部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49 个的主体分布在这里,少数民族人口 75190088 人,占西部人口总数的 21.512%,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71.456%。全国 154 个民族自治地方(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19 个自治县)中,西部包括了 5 个自治区、27 个自治州、84 个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方 95% 以上的面积,90% 以上的州,70% 以上的县(旗)在西部的范围之内。因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西部大开发一样,其目的和关键点都在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的发展,建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及根本归宿。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我们国家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目标,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按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首先发展起来,这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是全国的大局,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东部沿海地区要拿出力量帮助西部地区发展,这时,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大局,东部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谈到,先进地区要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实现共同繁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地区、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相一致的。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小康实现程度存在地区、民族间的不平衡,这是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造成的,其实质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果任其存在和扩展下去,往往会造成民族心理失衡,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最终会危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逐渐缩小

不同地区之间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防止和消除因过度社会差异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保证。

三、加快西部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维护和发展西部多元文化

中国西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中国历史上曾拥有过灿烂与辉煌。新中国成立后推进了西部的开发进程,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改变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的情况,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60 年代,鉴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国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行动。与以前的西部开发行动不同:这次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已经 20 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已加入 WTO 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特点是开放性、市场性。因而,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必定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各个民族文化全面接触、碰撞、交汇、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方能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持续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

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途。因为人类说到底是一种高级动物。之所以为“高级”,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以帮助自己适应环境,而一般生

物只能靠身体器官接受“物竞天择”。所以,人类要在进化的过程中避免种族的灭绝,就必须在生物性和文化性两方面均保持其适应性。即在生物性方面,要维护种族的多样性。因为,所谓适应是指生物体内部遗传基因适应于环境的需要而存在,能适应环境的基因被保存而传给下一代,不能适应于环境的基因就被淘汰。就整个种族而言,其基因库所具有的遗传基因种类愈复杂众多,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就愈强;反之,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就愈弱;当基因库中的基因种类单一而缺乏变异时,若环境发生变化,原来适应于过去环境的基因无法适应,基因库中亦无其他基因可以调适,种族就会走向灭绝。同理,在文化性方面,人类也要维护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鼓励各民族发展其特有的文化模式,惟如此,才能保证人类不断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长期以来,文化多样化的意义常常因为现代性的强烈诱惑而为人们所忽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接受了以欧美现代化发展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由于自身内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要实现这种转化,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价值观。因而主张采取“西方化”和“增长第一”发展模式,实行对西方开放、引进西方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措施。西方发达国家也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进行支持。联合国还制定了两个“发展十年计划”,帮助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发展。这些发展计划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1960 年—1970 年间,由于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的实施,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 5.2%,高于发达国家的 4.9%。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却更加突出。在经济上,大部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

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渗透到不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控制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发达国家将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不发达国家中去,使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外债负担日益沉重。在政治上,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不发达国家的政权更迭不休,军事政变频繁,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劳动力需求过剩,人才外流,农村凋敝,城市恶性膨胀。实践证明,“全盘西化”不仅不能给非西方社会带来现代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了对“现代性”及“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刻反思。

最初形成于欧洲的现代性,由于强调科学和理性,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而不仅西方社会继续强化其现代性,非西方社会也竞相追求现代性。20世纪是现代性全球化的时代。正因为“现代性”首先源自西方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先见和视阈,因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其观念扩张必定具有强势话语的特征,而由它所支撑的全球化及普遍化也必须接受异质的或至少是与之不同的文明或文化的批评和检审。因此,我们不能把全球化视为可以超越、荡涤或“平整”多元文化差异的总体化或一体化的同化过程。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和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伯森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应该是并进的,通过“普遍性特殊化”和“特殊性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可以特殊化,某种族群性文化或地方性知识也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从而实现“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所以,全球化实际上应该在具有同质化趋势的同时,具有异质化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地方既与外来文化相交流,形成为世界性文化,又保留和发展本

土文化特色,使社会生活愈来愈丰富,人民的选择越来越多,文化更加多样化。

20 世纪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忽视多元文化差异,企图借助市场经济的扩张和政治强制消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造成的:“现代性”对传统的拒斥导致了历史的断裂,现代经济理性主义对一切非物质性非现实性的历史观念的排斥,也增加了人们追认自身历史的困难,这就使得人们缺乏连续的历史感和文化认同以及共同体认同,使得现代个人的自我人格认同和表现无所依托,所以,与现代经济全球化扩张相伴的是,民族性的文化冲突、种族仇杀、区域性战争、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道德败坏、贫富差别悬殊、贫困人口增加、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有感于诸如此类的社会危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计划已经破产,因而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构想。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怀古取向,希冀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创意的思潮,它源于对现代性的拒斥,尤其是不满现代性所提倡的理性选择、所追求的客观准则及其所强调的统一性,大力倡导被科学主义所忽视、贬低、压制的非理性因素及人文精神,注重以主观体会为依据的自主性,强调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不论后现代主义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痛苦的社会实践和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使人类从追求现代性的狂热中醒来,逐步认识了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持续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1972 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7 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强调:“任何一项民族历史文化的毁灭或消失都将造成世界各民族遗产之有害的匮乏”,保证传之于后代是“当前和将来文化的丰富与和谐发展的一个源泉”。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了《世界文化报告 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提出在全球化加速过程中,保持文化多元性的问